

澳華文壇結出非虛構寫作碩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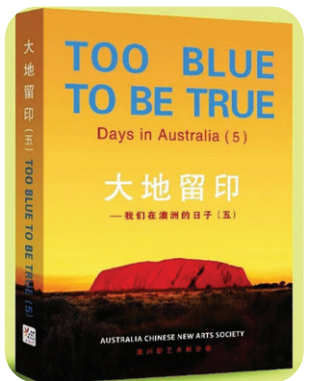


（前言：2026年8月5日下午，《大地留印》第五卷在新南威爾士州議會大廈大禮堂舉行新書發佈會，近兩百人出席。該大禮堂投入使用四十多年來，可能多次坐滿；但為華人坐滿，而且是為一場華人新書發佈會，恐怕是第一次。真是盛況空前，可謂創造了歷史。本文是該書序言。）

兩年前，我為《大地留印》第四卷作序，序言最後說：

讀完此書，有一個感覺。相信在我們中間，還有許多人還有許多故事，有像蔣海春和鄔峭峰這樣的，或者那些雖然平淡無奇卻很有意義的。那麼，還要編輯出版《大地留印》第五卷嗎？我覺得很有可能！

我榮幸言中了。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在澳洲的故事講不完，現在，《大地留印》第五卷又編輯出版了。



《大地留印》第五卷封面

在成書過程中，主編唐培良先生和策劃顧錚女士，曾把該書文章一篇篇預發出來讓大家分享。在這段時間，剛好一個世界性的“海外新

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於3月27日至29日在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隆重召開。作為悉尼華語作家協會榮譽會長、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和澳大利亞華人文團體聯合會召集人，本人應有關方面之請，給大會發去一封賀信。收印在我對非虛構文學的一些基本觀點；而寫信之時，在我的腦海中，更呈現我已經或將要為之作序的五卷《大地留印》裡一百幾十位作者一百幾十篇文章。我不禁驚喜地拍案叫絕：這不就是澳華文壇結出的非虛構寫作碩果嗎？！這不就是澳華文壇對世界華文文學做出貢獻的一個證明嗎？！從文學史上看，每個時代總會有一種備受追捧的文體。今天，非虛構文學的崛起，是文學發展的必然，事實上當前就出現洶湧澎湃的全球性的非虛構寫作的潮流——在澳大利亞，不就出現五卷《大地留印》這個潮流裡漂亮的浪花嗎？！

五卷《大地留印》有不少非虛構寫作的佳品。例如，前文說的《大地留印》第四卷裡蔣海春和鄔峭峰兩文，《我與房東喬治·鄧蒲賽一段特殊的經歷》和《第一個離別者——阿忠》，堪可位列其中。在《大地留印》第三卷中，可找出張群《我的三重人生》和崖青《從澳洲起飛》這些作品。再如第二卷裡映霞的《我是悉尼的賣花姑娘》和《他從欽江河邊走向世界》，兩篇均是很不錯的佳作。還有第一卷的夏兒《從悉尼的夜空瞥見的往事》和黃瑜《走上一條不歸之路》，等等。

如果說到現在的《大地

留印》第五卷，我想指出，武止戈的《12·14喋血黃昏生死紀——邦迪海灘槍擊事件親歷者說》是非虛構寫作的一個範例。去年12月14日，在悉尼邦迪海灘發生罕見的恐怖槍擊事件。很不幸，在這個一向平和的國度出現父子兩個恐怖分子，多達十五個正在享受陽光海水沙灘的男女老少被他們一一無辜殺死。武止戈和他四個朋友，當時就在現場，成了其中死裡逃生的倖存者。武先生不愧是曾經在大報工作過的記者，他以生動準確的文字，以最快的速度，把整個事件全面呈獻在讀者眼前，而且引導大家進入深度思考。他的親歷者“生死紀”寫出那位徒手奪槍的英雄、本身也是一名穆斯林艾哈邁德·艾哈邁德先生。在康復後這位英雄低調地回到了他的水果店。當被問及為何冒險時，他簡單地說：“我看到人們在死去，我必須做點什麼。”武止戈也採訪了那位開放公寓收留避難者的奧利·勞恩伯格先生。他說這次恐怖槍擊事件讓人們更加珍惜平常的日子，更加意識到社區和互助的重要性。



艾哈邁德·艾哈邁德先生徒手奪槍。

武止戈肯定，這片海

灘將永遠記得兩件事：2025年12月14日的子彈，和此後每一個專程前來獻花的清晨。後者，正是前者永遠無法摧毀的東西。他寫道：

海灘上的鮮花，是人類文明不滅的徵兆。當我們再次站在邦迪海灘，海風或許還帶著那日的鹹腥，浪聲或許還混著記憶中的槍聲。但我們手中的鮮花，將成為覆蓋血跡的另一種印記——這印記訴說的不是仇恨與恐懼，而是人類在經歷最深重的黑暗後，依然選擇用顫抖的手捧出美的能力。

的確，不管是一百年前或兩百年前就來到澳洲這片新大陸的英國移民，或是遠古以來就一直生活在這裡的原住民，或是新近這幾年從中國或其他國家前來安居樂業的新移民，我們都珍惜這裡每一個平常的日子，都珍惜各個不同的社區的交融和互助，都珍惜每一個族群每一個個人對這個國家的貢獻——種種“捧出美的能力”、種種“人類文明不滅的徵兆”。

《大地留印》第五卷中，許多作者都以各自親身經歷和體會向我們展示這些美好的景象。

例如，史雙元的《落地生根+落葉歸根》。如他所說，他“雙元”這個名字，似乎註定了他的一生要以雙重身份與多元文化結緣。他來到澳洲已經二十多年，工作一直沒有改變，就是幫助本地學生學習中文，認識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也說明澳洲華人在落地生根的同時在精神上落葉歸根。他提出了一個觀點：“在全球

化與數位化時代，海外華人的母語寫作與創作，是為人類文明多樣性‘續命’的重要方式。”他覺得，華人的母語創作，不是澳洲多元文化櫥窗裡的裝飾品，而是澳大利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是澳洲文化肌理中鮮活的、有機的組成部分。

趙旭發現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小學教育方式大相逕庭，常常和在接送孫子時相識的詹姆斯探討。詹姆斯說，當然是澳大利亞的小學教育方式好了。他說，一個人一生什麼最重要？沒有什麼比健康快樂更重要的了。而趙旭不敢苟同，說，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覺得兩國的基礎教育各有優勢，中國的文化基礎教育扎實，澳大利亞注意孩子的動手能力，如果各自吸收對方的優點，那樣會更好。趙旭在《藍眼睛詹姆斯》裡記載這些交流。他們都關心這個國家的未來。

蔣行邁在《悉尼PITT街“獨家村”留給我的記憶》裡回憶二十五年前一次華人作家和白人作家的聚會，其中有他終

身難忘的一段故事。他用行動和事實解答了一位白人女作家的疑惑。蔣行邁一直在想，華人新移民和本地西人在交流中建立起來的共識，會在“獨家村”裡和村外的世界裡被一直守護下去。

在《我參與了中文文書處理軟體的開發》一文中，洪丕柱則回憶他當年與應用語言學院代院長愛立克博士開發一個中文文書處理軟體的故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他們的中文文書處理軟體的樣本最終生成了，取名為《神州通文書》。作為當年從中國來澳的“四十千”留學生中的一員，洪丕柱顯然很與眾不同。

西貝在《紙上的腳印》指出，澳洲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對華文文學也極為重視，許多澳洲學者致力於推動中文與英文文學的交流與共融。她追憶詩人、小說家、出版人羅賓·楊舜女士通過種種努力最終出版雙語詩文集《Footprint on Paper紙上的腳印》。這堪稱澳華文學交融的一樁盛事。（未完）

何與懷



2025年12月15日，悉尼邦迪海灘，民眾為猶太節日慶祝活動期間槍擊事件遇難者致哀。圖/IC photo

掌紋

吳伯誠

一道掌紋
緩緩分岔成銀河
再延伸成無數星系
細小的支流
都通向光

群星沿著掌紋遙徙
一粒蔚藍色塵埃
在一枚旋臂裡
長出思想

我們一直仰望
以為自己閱讀星空
很久以後才知道
被閱讀的
一直是我們

我們一直校准座標
以為自己
就是那道光
後來才發現
自己是池掌紋中
一粒尚未醒來的塵埃

很久以後才知道
所有的星系
都握在看不見的手裡
宇宙仍在擴張
而我們
正慢慢回歸那道掌紋

不穿裙子的媽媽

（接上期）媽媽的故事不知為何讓我覺得滑稽好笑，沒想到童年的她真有膽子，敢真伸手去抓一把滾燙的花生米塞進嘴裡。可矛盾的是，現實中的媽媽是個不會吵架還動不動臉紅的人啊。

媽媽還說過她小時候另一故事，那就是她真的淘氣：“三孃當時正在和四川新詩人郭秋白談戀愛，那時三孃和我們住在一起。我把她藏起來的情書不知從什麼地方翻了出來，覺得信紙紙張好看嘛。被三孃發現了滿屋子追，我就把信紙滿屋亂撒，嘴裡還喊：快來看喲！快來看！三孃急得在後面直跳腳。”

我媽媽的三孃是我外婆的三妹，是我們的三姨婆。

講這個故事時的媽媽有點羞愧自稱她小時候是個“憨費”，這句四川話意指小孩子調皮搗蛋，但是沒壞心眼的那種淘氣法。我驚訝小

時候那麼淘氣憨費的媽媽，隨著她的成年，成為演員成為話劇表演輔導者等等一系列角色，成為我們三個孩子遠稱不上能幹的川籍母親，她小時候所有的稚氣都不見了。就在十幾年前，媽媽慢慢開始失憶，不再講說過去年代久遠的小故事。

幾張老照片簡略為我拼湊出她童年少年時的人生片段，後知後覺的我才後悔愧疚，沒有在她記憶清晰時多問多聽她說說往事。

幸運的是小我媽媽六歲的姨媽記憶力超常的好，姨媽和遠居在世界另一端的我可以網上聊天問答，我才漸漸得知更多家族往事，包括外公外婆感情風波的一些細節。就像外公對外婆不好，卻待外婆家人十分大方，他不僅讓外婆的三妹四妹及外婆的後母都吃住在家里，還資助了外婆的兩個妹妹讀書上學，也因此才有了小時候

我媽媽翻找出她的三孃戀愛信亂扔的滑稽事件。

還得知當與外婆分居很久的外公，終於起意要我外婆帶著她們的小女兒（我的姨媽）去巴中縣跟他重聚時，病重的外公卻不願讓我媽媽隨外婆同去。他說巴中是山區，那裡的人很野蠻，說怕我媽媽在那裡遇到壞人！

外公的理由是否為託辭不得而知，那時外婆的三妹已跟郭秋白結了婚，家安在了榮昌縣。約在1945年前後，我媽媽便去了榮昌住在三姨家中，之後她考取榮昌農職校。公費就讀是唯一的理由原因，姨媽補充說。

姨媽還提到她偷看過我媽當時就讀的成績單，她已記不得成績單上的具體分數，只有老師對我媽媽的評語：“敏而不學”幾個字記得很清楚。

姨媽之說讓我大樂，證實了媽媽在農職校兩年混時光的猜想。

姨媽說她姊（我媽媽）從小就不愛做家務，但非常活潑喜歡唱歌跳舞，她們還在

老家銅梁縣居住時，縣城舉行五四青年節學生大合唱，我媽媽居然是指揮！可她不准外婆和姨媽去現場做觀眾，也從不在她們面前高聲放歌。

媽媽也曾說過她小時迷武俠小說劍仙俠客，姨媽告訴我，她買了很多書霸藏在枕頭下自己看。姨媽要讀不得，只能趁我媽媽不在家時偷偷翻出來讀。

她說後來我媽媽愛上寫作，寫過不少文章發表在1949年前的南京晚報上。那份報紙的主編胡榮謙畢業於南京政治大學，筆名胡牧。他還是我媽媽的表叔但非真的血親，而是我外婆繼母家的8姊妹中第5妹妹的兒子。這樣細說過來，我猜想他一定是我媽媽生命中有位置特殊的人，我媽媽成年後使用一生字就他起的。更讓我意外的是媽媽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她仍然持續寫作繼續發表，我卻沒有讀到過她的文字。姨媽還說我媽媽年輕時與這位名義上的表叔曾有過短暫的紙上談情說

愛，但遭到我外婆強烈反對無疾而終。

姨媽講述另一細節更有意思，那是在1948年期間我媽媽曾在重慶紅巖村住過不短的時間。紅巖村的主人饒國模是我媽媽的四孃，那是共產黨領導人在紅巖村立腳出入的時期，亦是歷史上和今天著名的紅色據點。在那裡生活工作過的我媽媽，卻沒有染上那時代紅色，轉頭自在地奔去了她心心念念的文藝之路。當我上網去尋找有關榮昌農職校歷史時，發現媽媽她讀書時的畜牧科主任竟也是共黨員。就這樣，我媽跟“紅”沒有任何牽連。

但是她淘氣過、美過、唱過、跳過，夢過也深愛過。她的一生在我眼前似這不多的幾張老照片，清晰又隔著無數層薄霧，她生命中那些出現過的人事，她一生中絕大部分經歷，我大概永遠不能知道多少了。我也無法清楚體會，不穿裙子的媽媽是怎樣走過她的人生漫長歲月？

胡仄佳